

转向与超越:美国学界的五四研究

杨 华

摘要:美国早期的五四研究主要局限在思想史领域。1970年代以来,受新文化史和全球史的影响,美国的五四研究出现路径转向,开始从政治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地方史、全球史等视角发掘新的学术增长点。与此同时,受美国中国学从“冲击—回应”“传统—现代”到“中国中心观”范式变迁的影响,美国学者开始探讨五四运动的传统因素和五四运动在地方的表现等问题。受后现代史学的启发,美国学者试图以探求多元现代性和“去五四中心化”的研究路径来超越“五四范式”。美国的五四研究呈现出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从宏大叙事的五四到解构的五四、从五四到非五四的趋势,但缺乏中国本土五四研究中的现实关怀。

关键词:美国学界;“五四范式”;多元现代性;“去五四中心化”

五四运动是美国中国学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主题,新的理论与方法不断被运用,出现了许多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1970年代以来,美国学界的五四研究受国际史学思潮的影响而产生了研究路径的变化,由注重思想史研究转向新文化史和全球史视角;内容主要聚焦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等方面,其研究方法也受到美国中国学从“冲击—回应”到“中国中心观”范式变迁的影响。在后现代史学的影响下,美国学界开始超越“五四范式”,在探求多元现代性和“去五四中心化”两个方面对五四研究进行反思。

一、路径转向:从思想史到新文化史、全球史

20世纪初,西方各种史学思潮交相出现,不断更迭,逐渐影响了美国学界的五四研究,使其呈现思想史取向。自1970年代起,新文化史、全球史等日益风行,美国中国学研究范式随之变化,美国的五四研究也不断转变路径与更新方法,出现了新的学术视角和学术增长点。

(一)作为思想史的五四研究

20世纪初,美国学界发表了2篇来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见证者的文章。1921年,美国学者韩穆敦(Clarence H. Hamilton)撰文指出,从西方世界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在面对两种不同文化时内心产生了巨大的冲突。他们以《新青年》等刊物为阵地,运用新的思想方法,重新审视旧的传统、习俗和制度,并且特别关注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①。1930年,时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图书部主任的恒慕义(Arthur W. Hummel)指出,新文化运动发轫于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整理国故、开展古史辨运动和歌谣运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②。1948年,江文汉在论述中国学生运动时,涉及文学革命、反儒学、知识分子对现代科学的接受和关于西方化的争论等五四新文化运动方面的内容,并主要考察了学生运动

收稿日期:2019-07-3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20世纪中国史学通史》”(17ZDA196);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理论、范式、方法——近四十年来美国中国学对国内史学实践的影响”(19CLSJ10)。

作者简介:杨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济南250100;hyang@sdu.edu.cn)。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陈祖根同学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与整理工作,特此致谢!

① Clarence H. Hamilton, “Religion an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1921, 1(3), pp. 225-232. 韩穆敦1914-1927年在金陵大学任哲学、心理学教授和哲学系主任。

② Arthur W. Hummel, “The New-Culture Movement in China”,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30, 152, pp. 55-62. 恒慕义1915-1927年在中国,1924年后在燕京大学教书。

背后的思想因素^①。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关于五四的论著寥寥,既缺乏对五四运动和五四人物全面深刻的研究,更没有产生有影响力的著作。

20世纪中期,西方思想史研究跃居主流进入黄金期,成为一时之“显学”。彼得·盖伊(Peter Gay)提出“思想社会史”这一概念和方法,美国的思想史研究开始与社会史联姻,但仍局限于“知识分子的历史”^②。与此同时,在美国中国学人物传记研究兴起的背景下,关于五四知识分子思想的研究逐步展开。如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对陈独秀、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对李大钊、费侠莉(Charlotte Furth)对丁文江、贾祖麟(Jerome B. Grieder)对胡适、马时梓(Herman Mast)对戴季陶等的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填补了研究空白,为之后的五四研究奠定了基础^③。另外,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于1930年代提出的“观念史”概念余荫仍在。洛夫乔伊认为,“单元—观念”具有恒常性和连续性,因此思想观念的研究是可以摆脱具体时空和语境进行的^④。概括地说,美国这一时期的五四研究,是把不同人物在不同情境下的同一思想观念放在一起讨论,特别注意思想观念的普遍性,而对观念变迁的语境考察不足。1965年,郭颖颐在《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一书中,把批判传统和反对宗教的“唯科学主义”看作是五四前后一个恒常且连续的观念,而缺乏对科学在五四时期社会、文化语境下如何成为“唯科学主义”这一过程的探讨^⑤。

这一时期,美国五四研究最重要的2部著作是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和史华慈主编的《五四运动的反思:专题论文集》。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一书是美国五四研究的开山之作,在美国五四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该书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元角度探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但作为全书主轴的仍然是思想史意义上的五四思潮。该书原著名为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强调的是作为“思想革命”或者“知识革命”的五四。作者认为,五四时代的大前提是依靠“理知主义”,依靠“对传统重新估价以创造一种新文化,而这种工作须从思想知识上改革着手:用理知来说服,用逻辑推理来代替盲目的伦理教条,破坏偶像,解放个性,发展独立思考,以开创合理的未来社会”^⑥。1969年5月4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举办了“五四运动五十周年纪念讨论会”,之后出版了《五四运动的反思:专题论文集》。这次会议仍然带有“内在理路”思想史的意味,研究者们把思想看作是一种抽象观念,而不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现象。如贾祖麟,他意图把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者作为五四研究的切入点,实际上是将“自由主义”视为一个普遍性观念,并未细致区分不同自由主义者的“自由主义”^⑦。而史华慈早已清醒地认识到,“自由主义”“传统主义”“共产主义”在不同语境下其含义并不相同,不作区分的混用无益于对五四时期复杂思想状况的探讨^⑧。

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和史华慈主编的《五四运动的反思:专题论文集》引起了很多批评,其中以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意见最具代表性。德里克认为,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只是把政治和制度的发展视为各种思想产生的背景,但没有深入发掘“这些思想在其背景中与社会和政治运动”的

① Wen-Han Kiang, *The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New York: King's Crown Press, 1948.

② 黄进兴:《蜕变中的“思想史”:一个史学观点的考察》,刘东编:《德性与价值》,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93页。

③ Benjamin Schwartz, “Ch'ên Tu-Hsiu and the Acceptance of the Modern Wes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51, 12 (1), pp. 61-74; 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Charlotte Furth, *Ting Wen-chiang: 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Jerome B.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Herman Mast, “Tai Chi-t'ao, Sunism and Marxism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Shanghai”, *Modern Asian Studies*, 1971, 5(3), pp. 227-249.

④ 洛夫乔伊:《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张传有、高秉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9-20页。

⑤ 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页。

⑥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11-13页。

⑦ Jerome B. Grieder, “The Question of ‘Politics’ in the May Fourth Era”, in Benjamin I. Schwartz (eds.),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 Symposiu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72, pp. 95-101.

⑧ Benjamin I. Schwartz (eds.),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 Symposiu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72, pp. 10-12.

辩证关系,以致“五四思想成了脱离历史的抽象”^①。同时,德里克批评了史华慈主编的《五四运动的反思:专题论文集》,认为入选文章主要探讨的是五四前后思想与思想之间的联系,而“无一谈到这些思想蕴含在与五四运动直接相关的社会和政治关系之中”的问题^②。因此他认为,对五四的认识应摆脱抽象的思想运动,将其理解为“活生生的人们在具体社会关系中实践其理想的、行动的产物”,要关注五四运动的“社会关系”“空间关系”和“结构关系”^③。

思想本身具有流动性,常常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相结合,因此思想史能够不断跨越学科边界。“思想史不是一个既定的领域,它的疆界,或正确地说,它的生命注定随着概念与历史议题时间多样的关系之展开而展开。”^④1970年代以来,思想史经过“语言转向”“叙事转向”“文化转向”和“全球转向”,不断调整方向,兼容多元方法。所以,美国的五四研究也从思想史研究的框架下解放出来,在新文化史和全球史的推动下,拓展研究疆域,扩充研究主题。

(二)美国五四研究的文化转向

1970年代以来,新文化史逐渐兴起并成为一股重要的西方史学潮流。这一文化转向主要“通过对各种文化体系的调查去研究话语、仪式、再现中权力运作的机制、所使用的技术手段以及所达到的成效”,关注意义的产生过程^⑤。在新文化史的洗礼下,政治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地方史等多个史学领域焕发生机。在这些史学领域,美国的五四研究也得以开辟新的学术空间。

政治文化史突破了传统政治史的研究方式,提供了深入发掘五四意蕴的全新视角。“政治文化”概念所指涉的是“包含意义、实践、价值观以及决定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产生途径和行使方式的内在规则”体系^⑥。受新文化史旗手林·亨特(Lynn Hunt)法国大革命研究的影响,魏定熙(Timothy B. Weston)的研究既关注五四前北大新文化网络的形成、被利用以及教育和文化不断政治化过程,也分析了五四后北大内部的多重张力。五四前后政治权力在北大的产生和运作过程,折射出了北大激进风气背后的保守主义潜流。激进思想不是单独出现的,它“酝酿于与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对话之中”^⑦。

一直以来,五四大多被视为是一个思想现象,但思想和生活本就处于结合状态。“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是一种‘二而一’的现象”^⑧。想法和现实、意图与情境密不可分,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五四思想的运用和实践反映在其行为、仪式或生活空间等方面。除从政治文化角度探讨五四之外,魏定熙还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通过考察北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社交网络、衣食住行及休闲方式等方面解析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源和思想体现。蓝泽意(Fabio Lanza)的五四研究同样聚焦北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关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符号和仪式,注重意义阐释而不是因果分析。蓝泽意认为,政治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强度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宿舍空间里的宣传海报和讨论,学生之间会面和组织活动的方式,都是北大学生通过日常生活表达知识和政治立场的一种尝试^⑨。这一视角提供了人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理解,五四思想不仅存在于示威、游行、选举等政治方面,而且遍布于日常生活中。

随着地方史研究的兴起,美国学者眼光向下,除关注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之外,开始关注五四新

① 阿里夫·德里克:《五四运动中的意识与组织:五四思想史新探》,王跃、高力克编:《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2页。

② 阿里夫·德里克:《五四运动中的意识与组织:五四思想史新探》,王跃、高力克编:《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第51页。

③ 阿里夫·德里克:《五四运动中的意识与组织:五四思想史新探》,王跃、高力克编:《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第64-65页。

④ 思想史编委会:《思想史》第1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发刊词”,第ii页。

⑤ 林·亨特编:《新文化史》,姜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总序”,第7页。

⑥ 魏定熙:《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页。

⑦ 魏定熙:《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第261页。

⑧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兼论思想史的层次》,《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7年,第20页。

⑨ Fabio Lanza, “Politics of the unbound: ‘students’ and the everyday of Beijing University”,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2008, 16(3), pp. 569-599. 亦可参见 Fabio Lanza, *Behind the Gate: Inventing Students in Beij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文化运动在地方的展开。五四时期,地方知识分子都在动员和变化以参与和融入五四思潮,地方通过“不同层次的文化线索”与五四思潮汇流^①。叶文心较早关注地方五四,认为北京、上海等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情况无法体现它在浙江的特质,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杭州的激进表现则来源于浙江自身的内在矛盾。五四运动前夕,浙江北方日益发展,南方保守僵化,进出省城与中部乡镇求学的青年们在这两种秩序的“交错口”上产生了激进的“反传统冲刺”^②。随着研究的深入,叶文心进一步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浙江的特质概括为“中部乡镇激进主义”,探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种全国性现象在开展过程中的中心与边缘的空间维度及其本身在早期的分歧^③。

除中部乡镇的求学青年外,不少知识分子也出入城乡之间,在城市接受五四思想的冲击,回到乡村践行五四理想。其中,沈定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萧邦奇(R. Keith Schoppa)在《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一书中认为,沈定一在关于五四的一系列文章中,“已为中国政治问题找到了解决方案,那就是一种全新的人类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组织模式”。这一方案的核心仍然是群体,但“要重塑中国文化,就必须先培养重责任的个体”^④。这一群体导向的个人主义和社会组织思想为他9年后在衙前村的自治实践提供了理论准备,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跨过了时间和空间,进入到中国社会的末梢。

(三)美国五四研究的全球转向

新文化史下的五四研究主题越来越分散,学者们进行五四时期的日常生活史、微观史和地方史等研究,却忽视了宏观层面和全球视野。全球史的兴起为美国五四研究的新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全球史的核心在于跨文化互动,主要关注“国内变革与全球转型的脉络”中的交换、联系和流动,评估全球整合和地区的结构性转向^⑤。五四时期东西方思想文化的碰撞融合、一战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转型等,都天然具有全球史的意味,但以往的研究囿于理论方法和研究视角,并未发现全球视野下的五四研究。近年来,不少美国学者开始重视五四运动的全球意涵并各抒己见,如舒衡哲(Vera Schwarcz)提出了“全球的启蒙视野”^⑥。2019年4月12-13日,哈佛大学举办了“五四100周年:中国和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论文涉及五四运动与阿拉伯世界、五四运动与朝鲜“三一运动”的比较研究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港台、日本的传播和影响等全球史议题。2019年5月3-4日,哥伦比亚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举办了“全球五四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论文涉及一战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与在西方的中国工人等全球史议题。这两次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体现了美国学界五四研究的全球转向。

东西方思想文化的碰撞融合是五四时期争论的焦点,也是历来的五四研究者着墨颇多的部分。全球视野下的五四研究关注跨文化的思想互动,五四时期的历史不是单纯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而是由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共同参与、在互动中塑造。史书美从地区/全球的交互语境入手重新评价五四前后中国的现代主义,“在跨语境的历史情境和历史特殊性中,对有关中国主动性的问题进行辩证的分析”^⑦。在这个思路下,史书美在多重全球语境下考察五四时期的西方主义,关注中国人在面对不同他者时对西方主义的不同定位。史书美意图借此超越五四时期地区性话语语境中线性时间的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反传统主义和世界主义等传统研究主题,思考跨文化语境下中国作为“全球语境层面上的文化殖民场所”“对西方的策略性挪用”^⑧。

① 王汎森:《探索五四历史的两条线索》,《二十一世纪》2019年4月号。

② 叶文心:《保守与激进——试论五四运动在杭州》,汪熙、魏斐德编:《中国现代化问题:一个多方位的历史探索》,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13页。

③ Wen-hsin Yeh, “Middle County Radicalism: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Hangzhou”, *The China Quarterly*, 1994, 140, pp. 903-925.

④ 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周武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2页。

⑤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杜宪兵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5-9页。

⑥ 舒衡哲:《反思启蒙:超越激进人类中心主义》,《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7期。

⑦ 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页。

⑧ 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第145、153-154页。

全球史的另一研究取向则关注同一时期不同地区发生的相似事件之间的关联,探寻全球语境下的全球联动。1919 年是全球转型的重要时刻,中国、印度、埃及、朝鲜等地同气连枝,其有识之士均致力于推动反殖民运动,建立新的国家秩序。对这些几乎同时发生的类似运动进行探讨,有益于人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五四运动。在这方面,哈佛大学教授马内拉(Erez Manela)的研究有开创之功。他提出“威尔逊时刻”概念,试图把中国的五四运动、印度的非暴力抵抗运动、1919 年的埃及革命以及朝鲜的“三一运动”等世界各地的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运动都放在同一视野范围内进行建构。全球视野下的五四运动展现的是中国人和其他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致力于在国际社会中追求自决和平等的图景^①。

全球史视域下的五四研究还体现在对五四思想和运动方式的跨国、跨地区传播与被借用的情形进行考察。其中,大卫·肯利(David L. Kenley)从跨国视角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新加坡状况的研究尤为值得一提。大卫·肯利认为,新加坡的新文化倡导者挪用了五四运动的基本思想。五四时期新加坡的示威游行和文学刊物均展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海外的新面貌^②。大卫·肯利的五四研究对“跨国主义”“民族主义”以及“中国性”命题都提供了全新的诠释视角。

二、范式变迁:美国中国学视域下的五四研究

美国的五四研究受到国际史学思潮和美国中国学研究范式变迁的双重影响,而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影响所产生的变化是平行和有所交叉的。

五四运动常常被视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这与现代化理论的流行关系紧密。20 世纪中期,“许多社会学家与政治学家——特别是在美国——都鼎力支持将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奉为世界其他国家通往现代化之途的样板”^③。其中,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现代化理论在美国的影响最大。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以“理性资本主义之路就是现代化之路”为理论核心,将工业化、经济福利、民众对政治的参与、民族主义、科学和民主等视为现代化的主要特点,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两个经典范式——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的“冲击—回应”模式和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传统—现代”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撑^④。这两个模式是现代化理论在美国中国学研究中运用结果的一体两面。“冲击—回应”模式认为,西方现代化道路被奉为圭臬和标杆,中国传统没有现代化因子,要从传统向现代过渡,中国必须接受西方文明的冲击;而“传统—现代”模式则假设中国的传统和现代是对立的,“只有摧毁传统秩序之后才可能建立新的近代秩序”^⑤。

“冲击—回应”与“传统—现代”模式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五四研究。“冲击—回应”模式下的五四研究,特别强调西方文明对中国从传统跨越到现代的绝对贡献。其中,美国五四研究的奠基之作《五四运动史》即受此影响。周策纵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追求全方位现代化的转折点,西方现代文明是中国学习的范本。五四运动的精神“就是抛弃旧传统并创造一种新的现代文明以‘拯救中国’”^⑥。王润华认为,其师周策纵在哈佛大学开展的五四运动史研究受到“冲击—回应”模式的很大影响。在《五四运动史》出版后的 1963 年,他进入威斯康辛大学后,这一研究倾向才发生明显的改变^⑦。“传统—现代”研究模式下的五四运动被视为传统和现代的分水岭,并且现代对传统的取

① Erez Manela, *The Wilsonian Mo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95-196.

② David L. Kenley, *New Culture in a New Worl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Singapore, 1919-1932*,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 14-16.

③ 林·亨特:《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赵辉兵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④ 周晓虹:《中国研究的可能立场与范式重构》,《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⑤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90页。

⑥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500页。

⑦ 参见朱政惠:《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以历史学为中心》,上海:中西书局,2014年,第323页。

代是全方位而彻底的。用这个模式去研究五四知识分子,就会认为传统与现代在他们身上是截然两分、完全对立的,也会认为激进主义者身上不会有传统的成分,保守主义者也不可能与激进主义发生关系。在列文森看来,“五四代表了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一度把儒家学说奉为普遍真理走向借鉴西方经验而提出使中国摆脱困境的出路这样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的转折点”^①。

但这两种范式并未完全垄断美国的五四研究,部分学者也在寻找从中国传统出发研究五四的可能。史华慈在对陈独秀的研究中发现,尽管陈独秀以强烈的反传统倾向接近西方文明,但仍然深深嵌入传统的社会和道德取向中,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②。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中国学界对“冲击—回应”和“传统—现代”等以西方为中心的“二元研究范式”的反思,美国中国学研究开始走向“中国中心”。1984年,柯文(Paul A. Cohen)出版《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认为“中国中心观”的主要特征是以中国而非西方为准绳研究历史,展开区域研究,关注下层历史,引进跨学科方法^③。

在“中国中心观”的影响下,学者们发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身上激进的反传统观念与中国传统的关系。史华慈主编的《五四运动的反思:专题论文集》中的论文,研究思路不同于“中国传统—西方现代”的二元对立法,而是在中国传统和西方思潮之间寻找各种类似性和相融性。论文集的作者如贾祖麟、林毓生等在其后来的著作中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作出了不同以往的诠释。贾祖麟认为,虽然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与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关系密切,但胡适也存在洄向传统、超越“文化叛逆”和反传统主义倾向的一面,他关注中国作为一种文化如何生存下去的问题^④。林毓生认为,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早有渊源和先兆。他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指出,五四时期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根源反而在传统之中。中国传统一元论和唯智论的思想模式,塑造了知识分子“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的观念,并随后演变成一种整体观,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主义者便把传统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否定^⑤。

20世纪60年代,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和孔飞力(Philip A. Kuhn)等学者开启了美国中国学的地方史研究。随后在新文化史等史学思潮的推动下,五四运动在地方的开展情况成为五四研究的新领域。叶文心的《乡下人的旅行:文化、空间和共产主义的起源》一书是其中的代表作,也是她在前期关于杭州五四运动研究论文的基础上,对五四运动在地方开展情况的进一步思考。叶文心不再满足于把现代性视为与西方相遇的结果,而是努力探寻中华民族是如何积极建构现代性等问题。因此,她并未强调五四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破坏性,而是思考如何将中心与外围的空间维度作为一种全国性现象进行考察。叶文心指出,在五四运动的历史时刻有许多共同的主题,每个主题都在不同的空间内寻求各自的目标。杭州五四运动源于一群根植于衰落的中层乡镇的青年在跨越文化空间时的积极思考和质疑,而非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向下渗透或者现代和传统的相互对立^⑥。

社会科学理论也逐渐为五四研究提供理论支持,从而丰富了五四研究的分析方法。其中,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代际理论”成为对五四前后知识分子进行划分的重要依据。如舒衡哲运用“代际理论”对五四知识分子进行研究,认为五四时期不同代际知识分子既有代际合作又互有歧见,第一代知识分子像“蛇”,“以理性怀疑的毒液布毒于同时代人长期奉守的信仰”;第二代知识分子则是“夜猫”,“以来自海外的知识的喧闹来惊醒同胞们的昏睡”^⑦。1980年代,在另一本与五四相关的著作《胡适与中国知识分

① 列文森:《孔子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亚洲研究杂志》第20卷,1961年8月。转引自舒衡哲:《重评五四运动:在民族主义和启蒙运动之间》,王跃、高力克编:《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第76页。

② Benjamin Schwartz, “Ch'ên Tu-Hsiu and the Acceptance of the Modern Wes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51, 12 (1), pp. 61-74.

③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318页。

④ 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鲁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40-341页。

⑤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穆善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1-82页。

⑥ Wen-hsin Yeh, *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e, Space,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p. 2-6.

⑦ 维拉·施瓦友:《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李国英等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9-90页。

子的抉择》中,周明之也关注了知识分子的代际问题,认为“五四一代更侧重于存在经验,而早期改革者当然倾向于集体利益”,“在精神观点方面,五四一代与他们的前辈形成强烈的对照”^①。

三、超越“五四范式”:探求多元现代性与“去五四中心化”

在史学研究路径变迁和美国中国学范式转换的共同作用下,美国学界的五四研究也在悄然改变,并随着学术研究的积累形成了“五四范式”(May Fourth Paradigm)。“五四范式”是周启荣(Kai-wing Chow)、韩子奇、叶红玉、贾士杰(Don C. Price)在2008年主编的《超越五四范式:探寻中国的现代性》论文集中提出的概念。总体来看,“五四范式”是线性历史观下关于启蒙与进步的元叙事,这一叙事模式强调五四运动在近代史上的中心地位,并以进步意义上的五四运动作为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学者们指出,五四知识分子借以展望现代性愿景的西方思想是欧洲启蒙思想,自由、平等、个人主义、科学和批判精神成为他们试图建构的国家和社会的基础^②。

“五四范式”得以被破解,关键在于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史学在学界的席卷。在后现代史学家看来,人类历史并不具有内在一致性,也不是向着未来线性进步的,普遍理性也并不存在,值得关注的是时间的多线进程和历史的特殊性。传统史学研究中的宏大叙事被后现代主义消解。“曾经在史学领域中被政治权威、主流意识形态,以及形形色色的权力压制、忽略的因素”,开始“在史学领域中取得合法位置”^③。后现代史学对传统五四研究模式的解构,得到不少美国学者的认可,话语的形成、跨文化翻译以及文化资本的挪用等成为五四研究新的切入点。王德威在文学史研究中提出“幽灵论述”,对直线历史观进行了批判。“幽灵”这个概念受到了后现代理论的影响,意指历史的各种线索并不是依照时间顺序依次出现的,而是来回往复,如晚清小说便已经预先批判了五四时期的写实主义^④。

后现代视域下对“五四范式”的超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探求多元现代性,二是“去五四中心化”,二者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

后现代并不意味着时间序列上位于现代之后,它主要是一种研究方法,这一方法更新了历史叙述模式。传统的近代中国历史叙述模式,本质上是线性的现代化叙述模式。“这种简单的,线性的叙述结构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对现代性话语的复杂反应是没有办法做到完全公正的”,而只有复线的历史叙述模式才能揭示“历史扩散中利用与掩盖的面具”,“它也可以引导我们通向历史的其他道路”^⑤。真正的历史进程是多元竞逐的过程,范式话语垄断下的线性叙述模式正在被复调叙述模式所廓清。复线的叙述模式下,近代产生的现代性并不只有一元的五四现代性,中国人本身可以创造与五四现代性异质的多元现代性。胡志德(Theodore Hutters)认为,一种固定特征的现代性或者统一的现代性都是狭隘的,只有观察那些并没有实现的成为主流的东西,这样现代性才会以其潜在的无限多样性展现自己^⑥。现代性的广义取向得到美国五四研究者的认同。从广义上看,“‘现代性’就是每一个‘新’事物或‘新’时代所具有的那种特性”^⑦,因而现代性不应局限于启蒙、革命等现代性范式。

思想潜流、情感和文学等都能成为多元现代性的来源,德里克挖掘了原本被边缘化的无政府主义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在五四运动之前的几年里,无政府主义一直是新文化运动中始终如一的推动者,无

① 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雷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0-242页。

② Kai-Wing Chow, Tze-ki Hon, Hung-yok Ip, and Don C. Price(eds.), *Beyond the May Fourth Paradigm: In Search of Chinese Modernit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8, pp. 11-14.

③ 陈新:《实验史学:后现代主义在史学领域的诉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④ 郑文惠、颜健富编:《革命·启蒙·抒情——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学思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0-21页。

⑤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9、198页。

⑥ Theodore Hutters, *Bringing the World Home: Appropriating the West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p. 5.

⑦ 谢立中:《“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政府主义者在五四时期对激进思想和活动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①。某种情感也可以成为一种现代性。“情感话语不仅是内心情绪的表达与表现”,同时也涉及身份、道德、性别、权威、权力和群体。因此,李海燕在《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的爱情谱系》一书中展示了“爱在现代性进程中扮演的矛盾角色”,儒家的感觉结构、五四时期“启蒙的感觉结构”以及革命的感觉结构是该书“研究的一条主线”^②。李海燕的这一“情感谱系学”研究进路,无疑是后现代主义系谱学方法的体现。

后现代系谱学方法下的五四研究,很容易将五四的现代性追溯到晚清甚至更早时候。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王德威。他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一书中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观点,强调晚清先于五四出现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晚清早已在文学传统里内生了创造力和现代性,这种现代性被后来的五四文学压制逐渐隐而不彰,亟待学界发掘这一被忽略的现代性^③。可以说,现代文学史是最早突破“五四范式”的领域。除王德威外,李欧梵对现代文学和现代性的思考也为五四研究开一风气。一方面,他关注的是一种“未完成的现代性”,是现代性在五四之后成为对都市文化和现代生活的想象,但是这种现代性的建构并未完成^④;另一方面,他关注五四之前的晚清所产生的现代性如何遭到五四话语的压制。李欧梵在《文化资本的挪用:中国的五四工程》一书中指出,晚清知识分子培育了具有多元性和包容性的公共领域,五四知识分子将之变为“权力和影响力领域”,并使这一领域服务于以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为出发点的群体,进而展现了五四现代性的负面影响^⑤。李欧梵的研究深受后现代理论影响,并“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重新思考、解构了中国的现代性^⑥。

对多元现代性的探求必然会摆脱目的论式的五四认同,提倡“去五四中心化”。预设五四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先入为主,既忽视了自晚清以来与五四思潮一同竞逐的多元潜流,也过度凸显了五四运动的积极影响和实际效力。早在1972年,史华慈就对五四运动的中心地位提出质疑。他说:“五四果真像这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吗?”^⑦2003年,叶红玉(Hung-Yok Ip)、韩子奇(Tze-Ki Hon)、李朝津(Chiu-Chun Lee)在《中国的多元现代性》一文中指出了王德威、刘禾、李欧梵和叶文心五四研究中的“去五四中心化”取向,强调五四的反传统并不是通往现代性的唯一途径。“去五四中心化”不是去贬低五四运动在历史上的地位,而是要把五四运动与其他跨越时空的现代性联系起来^⑧。2008年出版的《超越五四范式:探寻中国的现代性》论文集是关于“去五四中心化”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该书从出版史、社会经济史、文学史等多个角度探寻更为复杂的现代性,试图通过超越被视为历史、社会和政治核心的价值观、变革模式等来探索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被忽视的东西。实际上,“去中心化”(Decentering)的概念就是一个与后现代密切相关的术语^⑨。该书作者在质疑五四运动的中心地位时认为,五四精英并不是唯一负责建设中国现代性的历史主体,正如关于“五四工程”的论述中所说的,五四产生了一种双重约束:它承诺了知识分子的解放,同时也

① Arif Dirlik,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Revisited: Anarchism and the Idea of Social Revolution in New Culture Thinking”, *Modern China*, 1985, 11(3), pp. 251-300.

② 李海燕:《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的爱情谱系》,修佳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8页。

③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11页。

④ 李欧梵:《都市文化与现代性》,《未完成的现代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6-131页。

⑤ Leo Ou-fan Lee, “Incomplete Modernity: Rethinking the May fourth Intellectual Project”, in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and Oldřich Král (eds.),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pp. 31-65.

⑥ 李欧梵、陈建华:《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60-162页。

⑦ 史华慈:《五四运动的反省》导言,王跃、高力克编:《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第3页。

⑧ Hung-Yok Ip, Tze-Ki Hon and Chiu-Chun Lee, “Review: The Plurality of Chinese Modernity: A Review of Recent Scholarship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Modern China*, 2003, 29(4), pp. 490-509.

⑨ Kai-Wing Chow, Tze-ki Hon, Hung-yok Ip, and Don C. Price(eds.), *Beyond the May Fourth Paradigm: In Search of Chinese Modernit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8, p. 29.

体现了精英主义和文化霸权^①。现代性的过程包含了中国社会各界(包括清朝改革派和激进派、中产阶级和流行作家、消费者和商人)的贡献,涉及文学思想、音乐、科学研究、商业和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因此,在五四和非五四因素竞逐现代性的过程中,五四知识分子通过压制与之竞争的多元现代性从而“发明”了五四的重要性。考察五四和非五四元素之间的辩证关系,方能还原历史现场^②。

四、余论:五四研究的异域与本土

经历了国际史学思潮的冲击和美国中国学自身范式的变迁后,美国的五四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无论是把五四看作是1915-1923年新文化运动的“大五四”还是1919年5月4日游行示威的“小五四”,早期的五四研究主要局限于五四时期和五四精英人物。随着研究的深入,五四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对象从耳熟能详的精英知识分子向非精英知识分子扩展,研究地域从北京、上海等五四中心城市向小城市甚至县乡渗透,研究时段从传统的五四时期向晚清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延伸。二是从宏大叙事的五四到解构的五四。一直以来,五四都被书写和神圣化为一种宏大叙事,在线性历史观下以民主、科学等启蒙观念或是民族主义等救亡观念为核心。这一目的论式的论述不仅伴随着五四研究中的“本质主义”和“整体主义”等方法论的不正确引导^③,还使得五四研究始终无法摆脱既定范式的约束。在后现代史学的解构下,五四运动不再被视为是必然发生的,而是一个充满偶然性和张力的过程。这一过程来自更多相互制约和相互依赖因素的竞争和角逐、压制与推动,五四运动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因素和一个结果。三是从五四到非五四。五四运动可以不被视为分水岭,但作为近代中国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它仍然是连绵山脉中的一个隆起地段。不能为了突破以五四为中心的历史诠释,太过于强调去除中心,从而失去了中心,造成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在史学实践中,五四研究的离心化也并未达到预想的“去中心化”目的,反而裂变出二元的五四和非五四,并意图通过以往认为与五四无关的非五四研究来展现五四。超越“五四范式”的结果是五四和非五四这一双星系统的运转成为新的研究取向。由此看来“这一‘去五四中心化’的口号虽然响亮,但其背后所展现的也许只是五四研究的深化和扩大,而并不是一种革命性的范式转移”^④。

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学界的五四研究与国内的五四研究不断进行异域与本土之间的交流互鉴。一些美国中国学家来华访学,从而获得了对五四研究颇有裨益的材料和思路。如1979-1980年间,在北京访学的舒衡哲收集了很多关于“新潮社”的资料,并与国内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和李泽厚一同分析了“中国六代知识分子”^⑤。1989年5月5-7日,舒衡哲和莫里斯·迈斯纳参加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举办的“五四运动70周年学术讨论会”,同与会的中国学者进行深入探讨。中国学者也走出国门,与美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在哈佛大学举办的“五四100周年:中国和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葛兆光、戴燕、陈平原、夏晓虹等中国学者也积极发言。在具体的五四研究上,中美学者也在相互影响中产生了许多成果。国内学界的五四研究受到美国中国学界五四研究进路的很大影响,特别是在文学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李欧梵、王德威、刘禾等学者超越传统五四研究范式的影响下,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文学史研究逐渐转向追寻“现代性”,“对于‘现代化’的单一的本质化的理解逐步转变

①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and Oldřich Král (eds.),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p. 23.

② Kai-Wing Chow, Tze-ki Hon, Hung-yok Ip, and Don C. Price(eds.), *Beyond the May Fourth Paradigm: In Search of Chinese Modernit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8, pp. 18-20.

③ 顾昕:《中国启蒙的历史图景:五四反思与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14-218页。

④ 王晴佳:《五四运动在西方中国研究中的式微?——浅析中外学术兴趣之异同》,《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⑤ 贺桂梅、倪文婷访谈:《回家的路 我与中国:美国历史学教授舒衡哲口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12页。

为一种多元的、复杂的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现代性’知识^①。这种对多元现代性的追寻,摆脱了对西方现代性模式的复制,从而发现了中国所具有的既承接西方又有所不同的现代性。同时,国内的五四研究成果“特别在一些传统优势领域,如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五四新文学等”,也传播到美国学界,促进了美国学界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②。

美国学者在异域视角下对五四进行解构,并始终注意吸收最前沿的史学思潮和跨学科理论,不断反思既有研究成果,产生了诸多学术亮点,但美国的五四研究往往是理论先行,缺乏对中国当代现实问题的关怀。与西方学界思想史研究渐趋式微不同的是,国内学界的思想史研究仍是热门。国内思想史研究一直兴盛的原因在于,思想史处理的问题始终与中国现实关联,“政治思考往往要通过历史叙述来呈现”^③,因此在国内的五四研究中,五四思想和精神始终与中国现实相关联,五四运动的重要性对当代中国来说不言而喻,无法如美国学界超越“五四范式”那样对五四进行彻底解构。然而近年来国内学者也不再局限于单纯从思想史层面对五四进行分析探讨,如杨念群批评了以往“五四解释学”的八股化和过度思想史分析的倾向,提出“五四研究的‘社会史化’”概念,关注“五四前后‘社会’作为一个论域的产生以及如何替代其他主题的历史”以及“五四发生的社会环境及其演化意义”^④。

100年来,国内的五四研究不断突破既有的研究局限,通过对五四思潮、舆论、团体、人物等专题性研究,从不同侧面厘清了五四运动的各种线索,还原和摹写了五四运动的丰富面相。这些研究成果既为五四研究的继续深入提供了学术史基础,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当代中国。国内的五四研究应当继续在关注中国现实的基础上,不断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正如任建涛所言,若要超越五四,应该“对五四形成的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现代性话语,采取同情和敬意的理解,并加以认同”,同时“在认同的基础上,更系统地建构符合健全理性、切合社会良性运转需要的当代中国现代性论说”^⑤。

Turning and Transcending: Studies on the “May Fourth” in the Circle of American Chinese Studies

Yang Hua Chen Zugen

(Advanced Institute of Confucian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P. R. China)

Abstract: The early studies on the May Fourth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mainly limited to the field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Since the 1970s, influenced by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and Global History, American academic circles changed its path, and began to explore new academic growth poin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tical Culture History, the History of Daily Life, Local History and Global History.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paradigm shifts from “Impact-Response”, “Tradition-Modernity” to “China-Centered Approach” of American Chinese Studies, American scholars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traditional factors and the local performance of the May Fourth. Postmodernism provided a multiple-tracks narrative model, and American scholars tried to pursue the plurality of Chinese modernity and decenter May Fourth beyond the May Fourth paradigm. The studies on the May Fourth of American scholars have shown three trends including expanding the scope of research, from the grand narrative to the deconstruction of May Fourth, and from May Fourth to Non-May Fourth. However, the studies on the May Fourth of American scholars lacks the realistic concern in the domestic studies on the May Fourth.

Keywords: American Chinese Studies; May Fourth Paradigm; Multiple Modernities; Decenter May Fourth

[责任编辑:以沫]

① 旷新年:《“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

② 杨一:《文明互鉴:海外汉学五四运动学术路径变化研究》,《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③ 葛兆光:《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文史哲》2011年第3期。

④ 杨念群:《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6页。

⑤ 任剑涛:《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儒家伦理及其现代处境》,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年,第242页。